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宓浩

超稳态

教科书上说(不少文章也这样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或者说既古老又年轻——年轻是实、古老为虚——正待发展之中的学科。这似乎成了定论,学子们也深信不疑。

因为年轻,童心尚在,稚气未泯,不成熟也就理所当然的了;因为年轻,还在发育成长,大脑、躯体、四肢均在发展之中,青春尚未焕发,离“风烛残年”遥远得很,何来什么“危机感”?

果真如此吗?

史书载:最早创见“图书馆学”一词是在1807年,德国人施莱廷格,离今已有180年之久矣!大家又公认,图书馆学的正式确立为1887年,马上也将举行一百周年大庆了。从时间观念来看,一百年应该说不是短暂的,当时呱呱坠地的婴儿大多已离开人世,幸存者皆老态龙钟,步履艰难了。一百年可以造就三、四代人。从科学发展史认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正是科学发展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科学的综合分化、渗透交叉,学科间的“婚配嫁娶”,衍生了多少代的子孙。说图书馆学年轻,不知相对什么学科而言?如果同亚里士多德老爷爷创建的古代哲学和科学相比,那确实是“小弟弟”了;但如果与二十世纪以来发展迅速的“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目前正在崛起的“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同观,应该说图书馆学又是爷辈了。就是拿同一血缘的情报学作衡量,我们那能说得上年轻,又怎能不感觉到后辈在猛超前辈啊?!

把图书馆学归结为一门年轻的科学并不

有利于图书馆学本身的发展,相反地却造成了看不到学科发展的症结所在,养成一些惰性和某种自我安慰与解嘲。反思一下,这一百年来,许多新学科展翅高飞,惟独图书馆学年轻而不发育,成长如此缓慢。“有心栽花花不开”,我们主观愿望都想提高图书馆学的社会地位,却偏偏社会如此“薄情”,此见如此“固执”。只能说,怨爹怨娘不如恨自己不成钢。

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年轻的图书馆学处在亚节奏的发展中,凝固在超稳态的状况中。它自宣告成立至今,“风貌故我、江山依旧”,象个小脚女人蹒跚来迟。麦维尔·杜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所树立的图书馆学思想,依然是今天图书馆学思想之本。当前,围绕着以借阅流通为主的图书馆技术处理,方法原则,早在一百年前就成型了。近几十年来,不论巴特勒、阮岗纳赞、谢拉,还是那个引起争议的波普学说、布鲁克斯思想,只不过是这个超稳态的图书馆学平静湖面中,投下的几块石子,激起了阵阵涟漪而已。即便是革命导师列宁的关于图书馆事业的那些精辟论述,也没能在这个学科领域中形成强烈的冲击波,掀起翻天大浪。

(“矫枉过正”、“重症猛药”,说得头过一些,也许成了谬误。但愿这一分析不是谬误,而是清醒剂。)

缘由

一百年来,图书馆学不善于随着不同的时代变化而变化,强烈的科学节奏感在这里显得停滞、消失。除了对于实体的经验描述或是工作方法、技术手段的改进探索外,它的基本理论体系,它的哲学思辨,几乎可以

说是片空白,即使有,一谓零散不系统,二谓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种理论的解释,而每个人都得从头开始作这番论证,例如关于对象的争论。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多数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并不在意这种理论研究,他们也并不感觉此中确有学问,需要探索。即便是执掌着图书馆的领导者,也没有那种需要。这种现象,巴特勒在本世纪卅年代他的名著中就已论及过了,事至今日,又有多大的变化呢?这样一种较普遍的漠视冷淡理论研究的现象,是导致图书馆学发展超稳态的缘由之一。

构筑在以出纳流通为中心——姑且认为藏书楼观念已基本破除——的一书一刊的图书整理与传递服务的方法,几十年如一日,鲜有变化。在这种原始层次上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又构成了图书馆学理论抽象的源泉。围绕着对这一实体活动的描述,被认为高于一切,理性主义的深层次探索又普遍缺乏。理论成为对现象、对实体的粗浅的说明,无力指导实践前进;而简单的实践又推导不出高奥的理论,形不成本质的抽象。加上理论研究的某些偏向,使二者的循环永远难以达到良性的目的。这是超稳态存在的第二个缘由。

传统的惯性观念,如主张图书馆工作的稳定性、延续性,阻碍了它的必要的适应变迁;把一书一刊的文献借阅服务看作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忽视了对知识内容、情报信息单元的传递,只能导致在低水平、低层次上的徘徊;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乃至高等学府的图书馆学教育,均以现有的图书馆工作的实际内容作为模式,构成框架,十九世纪以来的职业训练痕迹在在皆存,改革的呼声虽然强烈,落实并付诸行动却十分困难。既然面对着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又怎能使超稳态的状况有所变化呢?

强烈的封闭性——思想方法的狭窄性、

课题选择的直观性、研究内容的垂直性,使人们的思维向度只重于内倾和固定的框架之中。眼见到的就是图书馆这样一个社会实体,或者放大的图书馆事业这样一种概念。横向的触角、大系统的观念近年来虽然有所注意,只能说还刚起步,不足以改变它本身的封闭性——一些引文分析数据说明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倾性。封闭性使它具有较顽固的保守性和抗变性,也造成它的稳态状况的根由。

社会整体发展对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要求,对知识或情报的渴望尚没有强烈到足以形成强大的冲击来迫使图书馆工作向更高层次的服务迈进,而传统的惯性和小生产方式的观念也使我们缺乏必要的内张力作一番自我变更。我们所能贡献给社会,“输出”给社会的仍是如此微不足道——尽管教科书上可以大谈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可以比作“耳目”、“心脏”、“参谋”等等——我们岂能单方面要求社会必须给我们以强大的“输入”,“强求”社会的承认呢?即使社会给予应有的承认,——这种承认也是应该的——难道我们就不感到有愧吗?而且这种承认又能否持久呢?

由此,社会与图书馆之间的“输入”、“输出”,从长远意义上看,两者一定要保持均衡等量。只有当社会需求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力,图书馆的变更才是现实的,图书馆学的研究也才能抛开某种束缚而前进。同时,也只有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活动对社会的“输出”达到足够强的量时,社会才能对我们“刮目相看”。而这一百年来,社会对图书馆的要求呈慢速增长状态,图书馆对社会的贡献也处在“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游移中。因而,图书馆学研究的亚节奏发展也成“自然”了。

怎么办

“纠缠于实体难以使图书馆学大踏步前

进”，这可以说是一种较清醒的认识。图书馆学的基础研究要源于实践，又要高于实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图书馆学需要腾飞。我们感觉到了它的不足，隐约或甚至明显地意识到“危机四伏”，从而激发紧迫感，责任感，我们就有了腾飞的资本。为此，“清醒估计，猛击一掌，开展讨论，坚持前进”，是第一对策。这几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研究有发现、有进步，也有阻力，已经展开过的一些讨论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中途辍止。这次，作为全国学会出版物——《图书馆学通讯》关于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讨论，提出“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仍是要清理，要改革，要前进的”，并且深信“最后总是会有收获的”这样一种认识和做法，值得赞赏和提倡。但愿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而不要再次“暂停下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戳痛那心安理得、麻木不仁的感觉，焕发和组织起学科建设的热潮。

笔者无意在此提出某个理论体系或某种观点，笔者却是十分欣赏张晓林和彭修义同志的作法：要从宏观范围，整体理论上做起，探索和建立一个能够完整地表达图书馆活动本质联系的理论体系。那种以局部问题的研究，对实体活动的具体描述的方法应该抛弃了，代之以整体的、宏观的研究，放在社会大系统中的本质考察。所谓宏观研究，就是要对于一些能够带动整个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能够为各种具体理论问题指明方向、开拓领域的、全局性的课题和综合的开放性的探索。例如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学科体系结构、核心理论规范、概念和范畴体系等。对于八十年代一直争论不休的有关学科对象问题的讨论、或近几年来学科性质的重新认识之类课题，在一个整体理论框架尚付阙如，一致所公认的学科“范型”还不甚具备的条件下，即使再争议一千次、一万次，也许还是各说各的，而且都自认为最正确。所以，对策之二：改变研究方法，重

新寻找研究角度，重视宏观考察、整体建设。

我们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讨论，一定要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基础理论要发展，必须以图书馆事业发展为依托，从现实中吸收研究材料和课题，以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一切科学理论不仅在于认识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理论中介化趋势，向方法论转化，向现实转化，已经是当代科学发展的特点。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能成为在实践中活化的理论，指导实践，提高实践能力，理论不为实际服务，那就是对时代潮流的逆动，这样的理论将是无生命力的。

笔者最后提出在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讨论中，实行“童叟无欺”。笔者记得在孩提时期，常见商店门口悬挂着“童叟无欺”的牌匾，想来无非要表明，对顾客一视同仁。

学术领域中，“叟”者总是受尊敬的一方，他们年长，其中学术造诣高、研究功底深者大有人在。他们的文章一般说编辑部是不敢怠慢的。社会上的“荣誉迭加”原则，使即便有些内容平庸之作，也容易得到发表的机会。

至于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童子”，就没有这种幸运了。成果的发表，观点的首肯，都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为了获得成功，于是乎就有了攀附“智叟”，甘愿以自己研究成果恭请“名士”领衔联名之举。用心煞苦矣——说来惭愧，笔者本人也受到此类幸遇。

说这段话并不想批评这种已很自然的现象，只是想加上这么一个倡议，要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形成风雷交加、生气勃发局面，也得要“童叟无欺”。只要是有内容、有见地的好文章，一律给予发表，批评的或被批评的都可以谈自己的观点，学术上要有“争”有“鸣”，“刀光剑影”你来我往，不讲资历，只求探索真理。一潭静水或者锋面不交的状况成不了学术大气候。提出这一点，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或许是很有意义的。